

研究与探索

东北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格局的研究^{*}

赵宾福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 是开展考古学文化谱系格局研究的基础。时空框架揭示的是相同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年代先后关系和不同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遗存之间的年代对应关系。谱系格局揭示的是不同时间相同或不同空间范畴内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亲缘承继关系和不同考古学文化或考古学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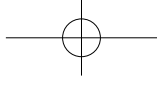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由于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纵向传承和横向互动所造成的直接后果, 是同一自然地理区域内或不同自然地理区域间考古学文化发展态势的改变, 因此对不同文化关系背景下所可能形成的具有人文内涵的“文化区”和“文化带”的讨论, 自然也属于考古学文化谱系格局研究的范畴。

本文以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研究为基础^[1], 进一步探讨东北地区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格局。

一、六个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

以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先后为线索, 以不受自然区的限制为着眼点, 以陶器反映的亲缘传承关系为前提条件, 全面审视东北地区目前得以识别和确认的二十多种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 发现至少可以从中划分出6个由两种或两种以上考古学文化构成的具有纵向传承演进关系的考古学文化系统(简称“文化系”)。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 12BK004)研究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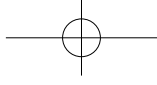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1. 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双房文化系统

从时间上看,双砣子一、二期文化为夏至早商时期,双砣子三期文化为商代晚期,双房文化为西周至战国时期,它们的年代彼此衔接。从地域上看,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遗存主要见于辽东半岛的南端,而双房文化的覆盖面则是整个辽东地区。据陶器间的亲缘关系考察,这些文化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因此应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可简称“双砣子文化系”)。

在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的陶器群中,分别含有较多的来自山东半岛地区的文化因素。如双砣子一期文化见有典型山东龙山文化末期的鼎足、鬲足、三环足器、瓦足盘、豆、器盖、带耳杯等^[2],双砣子二期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典型山东岳石文化因素^[3],有人甚至据此提出过它们应该是山东半岛地区同期考古学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的观点^[4]。其实,从陶器群的整体上看,双砣子一、二期文化虽然受到来自山东半岛同期考古学文化的强烈影响,但是始终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更没有完全被外来文化所征服。比如具有本土文化传统的平底陶器和外来的三足陶器一直处于分离状态,彼此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借鉴和吸收,更没有因此而碰撞出新的陶器器种。相反,在受到强大外来文化冲击的同时它们仍然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尽管势力比较微弱。但是当外部势力特别是岳石文化退出以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的土著成分很快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并且由此进入一个文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双砣子三期文化时期)。双砣子三期文化中虽然还可以看到少量以素面甗为代表的来自山东地区珍珠门文化的因素,但是这种外来文化的势力极其微弱。相反,双砣子三期文化陶器群中的绝大多数器类都是由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时期的土著成分发展而成的。这种文化的成长和演进脉络,在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的壶、瓮、碗、簋等几种典型陶器上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受山东文化影响才出现的陶豆,其型式间的演化轨迹也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说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和双砣子三期文化之间是一脉相传的。至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的陶器数量和种类相对较少,应该主要与当时的文化势力较弱和考古发掘工作薄弱有关。

双房文化晚于双砣子三期文化。从陶器群的类别和形态上看,该文化中至少有14种(型)陶器可以在双砣子三期文化中找到它们各自的祖型,而且与祖型之间的亲缘关系连接得非常紧密。首先是无耳壶、无耳罐、圈足簋、豆等4类9型陶器,均可以明显看出与双砣子三期文化的同类同型陶器存在直接的递进演化关系,其次是横耳钵口壶、横耳侈口壶和马鞍形贴耳罐等2类5型陶器,有的是直接由双砣子三期文化晚期的同型陶器演化而成,有的则是在两型陶器制作工艺结合以后碰撞出来的新器形。根据以上所作的陶器亲缘关系分析,足以证明双房文化应该是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继承者。

总之,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是血脉相连的同一个文化系统。这个系统的陶器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平底瓮、罐、壶、碗和圈足簋、豆为基本器



类，鼎、鬲、甗等源自山东地区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珍珠门文化的外来三足陶器很少；二是大多数陶器素面无纹，只有横耳壶、无耳壶、瓮、圈足簋等一部分器形表面饰有成组的阴弦纹、网格纹、连点纹或凸棱纹。另外，该文化系的房址和墓葬多为石块垒砌而成，其中夏商时期的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主要以积石墓地为主。到了两周时期的双房文化阶段，除了年代最早的岗上墓地还保留着原来的传统形式以外，积石墓地在这一时期已经演化成单个的石棺墓、大石盖墓、石棚、土坑墓等多种墓葬形式。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该文化系当中最具特色的曲刃矛、柱脊曲刃剑、方釜斧等青铜武器。

伴随着青铜兵器的出现，“双砣子文化系”由原来的弱势一度发展成为强势。分布地域也由原来夏商时期的辽东半岛南端迅速扩张到西周至战国时期的整个辽东地区，而且影响范围甚至还波及辽西山地地区、朝鲜半岛和第二松花江流域。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极度膨胀的过程中，文化的发展也吸收或融入一部分其他文化的因素。例如在辽东北部地区出土的双房文化陶器群中，有些器形（竖耳壶、扳耳罐、横耳罐、横耳盆、扳耳盆、圈足碗）是不见于原来的辽东南部地区的。根据它们的造型特点和文化传统分析，明显可看出是由当地夏商时期马城子文化的同型陶器演化而成的^[5]。换言之，双房文化主要是由辽东南部地区的双砣子三期文化发展而来，但是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北扩至辽东北部地区以后，曾经融入一少部分当地马城子文化的因素。依据这部分文化因素，可考虑将来进一步把双房文化区分成南北两个地方类型。

2. 马城子文化→西团山文化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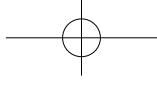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马城子文化分布在辽东北部地区，年代为夏商时期。西团山文化分布在第二松花江流域，年代为两周时期。从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来看，地域上虽然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时间上前后相连，而且两种文化的陶器种类和形制特点均表现出相当多的一致性。特别是马城子文化晚期陶器和西团山文化早期陶器之间，形态过渡和演进迹象十分明显。

首先，两种文化的陶器群完全相同。墓葬出土的器物种类均为壶、罐、钵、碗，遗址出土的典型炊器均为鼎、鬲。

其次，两种文化的陶器特点基本相同。所有的壶类器均有无耳、扳耳、竖耳、横耳之分，绝大多数的罐类器和碗类器都施横耳，钵（盆）类陶器多无耳或施扳耳。遗址中所见的鼎、鬲也同样施有扳耳或桥耳。陶器均素面无纹，质地分夹砂和泥质两种，从数量上看夹砂褐陶占绝大多数。

第三，两种文化共有的壶、罐、碗、钵、鼎、鬲等六类典型陶器当中，至少有30个型别的陶器彼此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递进演变关系。

除以上陶器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亲缘关系以外，两种文化在墓葬的形式上也有相近之处。马城子文化时期的墓葬主要是洞穴墓，但也同时存在少量的埋在山洞以外的石棺墓。洞穴墓是把许多死者埋葬在山洞里面，由于多数是就地掩埋，所以很少见到墓圪，但也有少数墓葬使用简单的石棺。西团山文化的墓葬主要是石棺墓，葬具结构有块石垒砌和



板石立砌之别。

比较两种文化的墓葬习俗,其共性主要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在安葬死者的理念上均与石头有关,或为石洞,或为石棺。从时间早晚来看,应该是先为洞穴墓,后由集体掩埋的洞穴墓逐渐演变成个体掩埋的洞外石棺墓。二是在死者的尸骨处理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火葬现象。

综合以上分析,现有足够的理由认为,第二松花江流域的西团山文化应该是由辽东北部地区的马城子文化发展而来的,它们虽处异地,但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可简称“马城子文化系”)。这一系统在夏商时期分布在辽东北部地区,到了两周时期迁徙到第二松花江流域。不过,在这种文化的整体迁移过程中,也有一部分留在了当地,并且融入由辽东南部地区扩张到此的双房文化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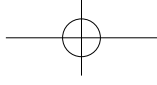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3. “平安堡二期遗存”→高台山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系统

“平安堡二期遗存”的年代为夏代早期,高台山文化的年代为夏代中晚期至商代晚期,两者的分布范围均在以柳河流域为重心的辽西平原北部地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平安堡二期遗存”材料较少,但是所反映的现象却十分重要。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批材料为解决高台山文化的起源和辽西平原地区三足陶器的产生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平安堡二期遗存”主要包括两种陶器。一种是具有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平底器,另一种是无实足跟的空三足器腿部残片。从形制特点上看,前一种平底陶器的腹部出现竖耳或扳耳,与新石器时代的同类陶器相比已经有一定的区别。后一种空三足器腿,没有实足根,又素面无纹,形制与属于山东半岛岳石文化早期的尹家城 T162 ⑦:16 甗和照格庄 H36:9、H5:6 甗足十分相像^[6]。同样形态的标本,在辽东半岛的双砬子二期文化中也有发现^[7]。由此看来,“平安堡二期遗存”的甗足标本很可能是山东岳石文化早期素面袋足甗通过辽东半岛间接传播至此的一种外来文化因素。

将“平安堡二期遗存”的两种陶器,与本地区后来出现的高台山文化早期 I 段陶器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平安堡二期遗存”仅见竖耳筒形罐、竖耳盆和袋足甗,高台山文化早期 I 段不仅同样见有这三种陶器,而且还新出现竖耳筒形鬲和竖耳盆式鬲。依据该现象推测,辽西平原地区从高台山文化早期 I 段开始出现的竖耳筒形鬲和竖耳盆形鬲,应该是“平安堡二期遗存”时期本地竖耳平底筒形罐和竖耳平底盆与外来素面袋足甗结合以后产生的新器类。外来三足陶器的出现和新式三足陶鬲的产生,不仅标志着辽西平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以素面鬲和素面甗为代表的三足陶器很快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成为高台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器形。所以说,“平安堡二期遗存”应该是高台山文化的前身。

继高台山文化之后,辽西平原地区的考古发现尚属空白,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能够说清高台山文化的发展去向。1990年9月,张忠培先生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



学术讨论会上,首次提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由高台山类型系统发展来的”^[8]。随后,朱永刚先生在1991年10月提交给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的一篇论文中,重复提出同样的观点^[9]。现在看来,这一认识仍然是正确的。

从高台山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陶器群观察,它们之间的共性是均为夹砂红褐陶系,采用泥圈套接法制作而成。陶器火候不高,质地较为疏松。几乎所有的陶器都不施纹饰,但外表多数都经过打磨或刮抹。尤其是在口沿外叠唇、流行素面直腹鬲和陶器外壁贴附扳耳、桥耳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两种文化都以鬲、甗、鼎、罐、壶、盆、豆、杯等构成基本器物组合,其中以鬲、甗、鼎为代表的三足类陶器,不仅形制十分接近,而且从高台山文化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演进脉络非常清晰。其中直腹鬲和甗是一脉相传的,而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新出现的环耳鬲和环耳鼎,应该是由高台山文化晚期环耳罐和平底鼎两类陶器结合以后创造出来的新器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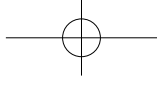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处于夏商阶段的高台山文化主要分布在辽西平原的北部地区,相当于两周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则主要分布在辽西山地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教来河流域。由于两种文化年代先后衔接,陶器亲缘关系十分明显,因此可以认为,由“平安堡二期遗存”发展而成的高台山文化,到了西周初年可能是迫于某种压力一举向西迁移到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山地地区,并且在那里最先演变成夏家店上层文化,然后又逐渐向南扩展到老哈河和教来河流域。当然这一文化在由东向西转移的过程中,还可能吸收一些其他文化的因素,比如在夏家店上层文化中所看到的乳状袋足鬲^[10],很明显就是阜新地区出土的魏营子文化乳状袋足鬲^[11]的后裔。

总之,“平安堡二期遗存”、高台山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应该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可简称“高台山文化系”),该系统最具代表性的特征是夹砂红褐陶系、外叠唇作风和素面竖耳、扳耳直腹陶鬲。

4. 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支)→塔照一、二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系统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范围很广,除了东北的辽西山地地区以外,还覆盖燕山以南的华北北部地区。根据地域的不同和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可将这种文化区分为以燕山为界的南北两个大的地方类型。为叙述方便,这里暂分别称其为南支和北支。

分布在燕山以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支),也有人称其为“大坨头文化”。由于以往发现的材料比较零星,因此有关这类遗存的发展去向问题一直是若明若暗。不过,最新发表的北京市房山区塔照遗址的发掘材料,为认识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支)的流向提供了新的线索。从报告的认识来看,塔照遗址出土的商周时代遗存前后可分为五期也就是五种不同的文化,其中塔照一、二期遗存是新发现的两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塔照三期为张家园上层文化,塔照四、五期分别是西周燕文化和东周燕文化。从文化关系的角度上看,报告认为前三期文化应该是同一系统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12]。张忠培先生在为《镇江营与塔照》报告所写的序言中,进一步认定塔照一、二、三期文化应该



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支)的延续,而且指出其中的第三期文化也就是张家园上层文化应该是“召公被封时的北燕文化”。由此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支)应该是经过塔照一、二期两个阶段,发展成以张家园上层文化为代表的北燕文化,并最终融入召公封北燕之后的西周燕文化之中^[13]。为方便叙述,可将这一文化系统简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南支)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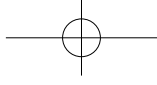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支)的发展去向,限于目前的材料和认识,尚难说得清楚,因此暂不讨论。

5. 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系统

嫩江流域的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和汉书二期文化,不仅共处于相同的自然地理范畴之内,而且年代自夏至西汉紧密相连。从它们的陶器上看,各个文化的时段特征和不同文化之间前后承继的演化步骤也表现得相当清楚。因此嫩江流域夏至早商时期的小拉哈文化、商代晚期的“古城类型”、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白金宝文化、战国至西汉时期的汉书二期文化,相互之间应该是一种血脉相连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可简称“小拉哈文化系”)。

年代最早的小拉哈文化时期,陶器主要为素面平底器、乳钉耳和竖桥耳,以及台底(假圈足)作风比较常见。基本器类为平底筒形罐、瓮、壶、单耳杯和台底碗等。尽管目前尚难找到可以与其对比的更早阶段的遗存,但是不难看出这种文化的主体成分仍然保留了较多的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平底筒形器的文化传统。所以,尽管小拉哈文化时期已经出现像白金宝遗址 86F3028:3 那样的素面陶鬲,并据此标示着该文化已经与以往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显著的区别,但是陶器的整体文化面貌并未因此而发生较大的改变。除了增加壶、瓮、碗、杯等一些新的器形以外,陶器造型总体上仍然是以平底器为大宗^[14]。

“古城类型”的陶器同样可划分为两类^[15],一类是以平底陶器为代表的罐、瓮、壶、杯、碗等,这也是该遗存的主体器形。另一类是以饰花边堆纹和绳纹为主要特征的高领鼓腹鬲。与小拉哈文化相比,“古城类型”平底陶器的基本器类并没有改变,器物造型仍然流行乳钉耳和竖桥耳,少数陶器还保留有台底的遗风。特别是筒形罐、鼓腹瓮、壶、盂、带耳杯等,形制与小拉哈文化的同类陶器一脉相承,这表明“古城类型”应该是由小拉哈文化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古城类型”的平底类陶器,也和小拉哈文化时期的平底类陶器存在一定的区别,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了绳纹和几何形、动物形篦纹。前者应该理解为是受外来绳纹鼓腹鬲表面纹饰影响的结果,后者则是具有本土特色并且在后来白金宝文化时期盛行一时的新因素。再从三足陶器上看,夏至早商时期的小拉哈文化和商代晚期的“古城类型”虽然都出现少量的陶鬲,但是它们的形制特点和文化来源各不相同。小拉哈文化的鬲,从形制上看应该是来自辽西平原地区高台山文化早期的因素。由于这种鬲的表面没有纹饰,因此对嫩江流域小拉哈文化的其他陶器并没有产生纹饰方面的任何影响。“古城类型”的陶鬲,无论是纹饰还是器形,都表明它应该



是来自辽西山地地区魏营子文化的因素。因这种鬲的表面饰有绳纹,所以对嫩江流域“古城类型”的陶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一部分平底筒形罐的表面已经出现绳纹鬲上的绳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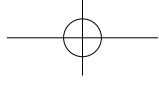
总之,嫩江流域在夏至早商和商代晚期这两个阶段上,先后受到来自南部地区以鬲为代表的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是陶器群的主体成分仍然保持着以传统的平底陶器为主。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仅仅表现在商代晚期时绳纹的传播和借用上,而器物形制本身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也未因此而出现新的器形。所以说夏商时期的嫩江流域主要还是一个使用传统平底陶器的时期,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之间的转化,主要表现的应该是平底类陶器在纹饰、形态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阶段性差异。而作为来源有别的小拉哈文化和“古城类型”中出现的陶鬲,其重要意义则是起到标识年代和作为文化传播证据的作用。

如果说小拉哈文化素面鬲的出现,标志着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但是这种外来因素对当地的传统文化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古城类型”时期开始传入的绳纹鼓腹鬲,也只是在输入绳纹方面得到当地文化的认可和借用。那么当外来的绳纹鼓腹陶鬲和当地的绳纹或素面筒腹陶罐真正实现器形上的融合并且在当地碰撞出了两种新的器形——绳纹筒腹鬲和素面筒腹鬲的时候,不仅标志着“古城类型”已经正式演变成白金宝文化,同时也标志着嫩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实现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质的跨越,并且从此走上一个以鬲为主要炊器的新的历史时期。

从白金宝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址材料来看,瓮、壶两类陶器的形态和“古城类型”的同类陶器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承继关系,从一些常见的几何形和动物形纹饰也明显可以看出是由“古城类型”时期的同类纹饰进一步演化而来的。特别是早期的绳纹筒腹鬲和素面筒腹鬲,从形态上一眼就可以看出其上部是由平底筒形罐改制而成的,下部借用的是鼓腹鬲的袋足部分,两部分的接合处不仅痕迹明显,而且为了防止断裂还在接合部位贴附一周起加固作用的泥条堆纹。

从白金宝文化自身的陶鬲演化过程上看,主要是在技术方面经历一个由生疏到娴熟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反映在鬲形上便是一个由高裆向矮裆、由腹足接合痕迹明显向腹足浑圆一体、由粗糙到精致的演化过程。可是当这种技术被使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并且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以后,发明这种陶鬲的先民们又在陶鬲的制作手段上进行一次新的革命,这种革命的时间应该是春秋战国之际,革命的标志则是放弃了在筒腹罐下面安装三个袋足的制鬲方法,而开始采用直接在筒形器的下部捏合出三个乳状矮腿而使其变成陶鬲的新工艺(筒改鬲)。这种制作陶鬲技术的改变,同时也标志着白金宝文化已经正式演变成汉书二期文化。

从器形上看,白金宝文化的陶鬲裆部普遍较高,因此遗址中发现的与其配套使用的陶支脚均呈馒头状,形体比较矮小。汉书二期文化的陶鬲裆部普遍较低,所以遗址中出土的用以支鬲的陶支脚均呈实心喇叭状,形态较高。需要说明的是,白金宝文化和汉书



二期文化的陶鬲虽然制作工艺有别，而且由此导致鬲裆部位的区别比较明显。但是从陶鬲的整体形态上看，汉书二期文化的陶鬲仍然是一种无耳的直腹筒形鬲，而且也仍然存在着绳纹鬲和素面鬲两种不同的类型。

另外，白金宝文化墓葬出土的陶器也和汉书二期文化的墓葬陶器存在较大的共性。这种共性不仅表现在二者的主要器类基本相同上，而且还体现在许多器形之间前后具有明显的递进演变关系上。仅以壶类陶器为例，就至少可以看出有七个型别是两种文化自始至终共同存在的，而且它们的演化脉络均表现得十分清楚。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是在嫩江流域相继发展起来的四种具有内在联系的考古学文化。这四种文化之间的确是一脉相传的，的确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由于该系统的文化是在长期使用平底陶器并在夏商时期受到来自魏营子文化无耳陶鬲和高台山文化高领杯口壶、直口壶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它的陶器特点是除了篛纹以外还存在大量的绳纹，流行无耳的绳纹直腹鬲或素面直腹鬲，流行高领的杯口壶和直口壶（喇叭口壶应该是外来因素），且多不施耳或只见少量的竖耳。

6. 兴城文化→柳庭洞文化系统

兴城文化和柳庭洞文化均分布在图们江流域，前者年代为夏商时期，后者年代为西周至战国时期。从陶器的亲缘关系上看，柳庭洞文化应该是由兴城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两者应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可简称“兴城文化系”）。

兴城文化和柳庭洞文化的陶器特点是素面无纹，以平底陶器为大宗。共见的器类主要有斜腹罐、直腹罐、鼓腹罐和钵、碗、盆等。区别仅在于兴城文化时期发现了较多的鼓腹瓮，柳庭洞文化时期见有少量的圈足碗和豆。不过，依据图们江流域汉代的团结文化时期尚有带柱状耳的鼓腹瓮推断，介于晚商之后和西汉以前的柳庭洞文化也一定会有鼓腹瓮类陶器存在，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而已。将两种文化共见的陶器进行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它们之间至少有 4 大类 9 个型别的陶器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从早到晚的递进演变关系非常清楚。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图们江流域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始终没有发现三足类陶器，文化的发展一直保持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以来便已经形成的平底筒形器传统。从本地区发现的战国以后的团结文化陶器来看，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两汉时期。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图们江流域应该是一个相对封闭、文化发展很少受到过外界影响的地区。但是从柳庭洞文化的发展去向来看，除了在当地演化成两汉时期的团结文化以外，还有一支终于离开自己的原生地而向西进入第二松花江流域，并且在那里形成汉代初期以黄鱼圈珠山 M1 为代表的遗存。这一现象的揭示，不仅表明图们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在其发展的高峰时期也曾对外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也肯定了乔梁先生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提出的“黄鱼圈珠山 M1 这类遗存的源头，很可能要在吉长地区东侧

的长白山地一带寻找”的说法^[16]。

以上六个文化系统的确认，从根本上说是对诸考古学文化及创造这些考古学文化的人群之间亲缘关系的一种界定。从六个文化系的分布区域上看，除了夏家店下层文化系（南支）的活动范围在燕山以南的华北北部地区以外，其他五个文化系的诸考古学文化均主要活动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为了更好地把握这五个文化系之间的发展脉络和时空关系，现将它们统一归纳成一个表格，是为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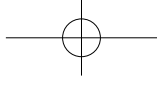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表一 东北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系统的划分、演进及时空关系比较

期 段	西部区（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			东部区（长白山—千山文化带）							
	嫩江流域	辽西山地	辽西平原	辽东南部	辽东北部	第二松花江	图们江流域				
两周时期	战国			西周至春秋							
	汉书二期文化			双房文化（晚期）	西团山文化（晚期）	柳庭洞文化（晚期）					
夏商时期	白金宝文化	夏家店上层文化		双房文化（早中期）	西团山文化（早中期）	柳庭洞文化（早期）					
	“古城类型”		高台山文化（晚期）	双砬子三期文化	马城子文化（晚期）		兴城文化（晚期）				
	小拉哈文化		高台山文化早期	双砬子二期文化	马城子文化（早期）		兴城文化（早期）				
			“平安堡二期遗存”	双砬子二期文化							
文化系	①小拉哈文化系			②高台山文化系		③双砬子文化系		④马城子文化系		⑤兴城文化系	

7. 辽西山地地区其他几种文化遗存的说明

从辽西山地地区发现的7种具有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遗存）来看，除了夏家店上层文化被确认为高台山文化的后继者之外，包括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支）在内的其余6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在现有的材料下均难以说清它们各自的源流或彼此间是否存在文化上的传承关系。因此为了便于澄清问题，并有利于今后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这里在没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暂和其他学者一样，仅分析和讨论它们各自的文化结构或不同文化成分的来源，而不做纵向的文化传承关系和所属文化系统方面的认定。

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支）以绳纹甗、尊式鬲、素面鼓腹鬲、素面甗式鬲最具特色。该文化的起源比较复杂，既有对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系统本土文化成分的承继（如尊、钵形鼎、浅盘豆等），又有来自对中原地区以绳纹为代表的后岗二期文化因素的吸收（如无腰隔绳纹甗、绳纹中口深腹罐、绳纹深腹扳耳盆等），还有由这两种文化成分碰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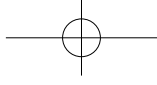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成的新器形（如尊式鬲等），另外还能看到一些来自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如鬻、爵等）。关于这种文化的发展去向，有些学者认为它可能有一部分融入后来的魏营子文化当中^[17]。但是从相互可比的材料来看，一是绳纹并不一样，魏营子文化的绳纹多数经过刮抹，纹痕很不清楚。二是极少见到的筒式素面鬲，形态相去甚远，其他陶器更是不具有任何可比性。再有魏营子文化主要以夹砂褐陶为主，两种文化在陶系上存在着本质的不同。所以，仅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支）的去向仍然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发现和探讨的问题。

魏营子文化的内涵本身就很模糊，近年来在文化性质、年代、分期、分布等问题上又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对魏营子文化的界定是年代为商代晚期，下限到不了西周。地域以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周边地区的同类遗存发现较少。基本器形当以喀左后坟出土的一批材料为代表，另包括阜新平顶山遗址的第三期遗存和义县向阳岭遗址第三期遗存，曲刃青铜短剑不是该文化的遗物。

关于魏营子文化的形成，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它是部分地继承了当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支）的因素，部分地吸收了来自西部长城地带朱开沟文化以绳纹花边鬲为代表的因素，还有一部分因素是来自东部地区的高台山文化。其实就魏营子文化的主体成分来看，多是具有高台山文化的特点。特别是一直被认为是从西边传入的高领花边鬲，其实很可能是由高台山文化的高领花边鼎发展而来的。从彰武章古台镇出土的高台山文化高领扳耳鼎，到魏营子文化喀左南沟门的高领花边鼎式鬲，再到魏营子文化阜新平顶山H201:1高领花边鬲，演化脉络十分清楚。因此，随着日后发现材料的增多，有可能会逐步证明魏营子文化应该是高台山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其去向很可能是随着高台山文化的整体西迁而一并融入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其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乳状袋足鬲很可能就是来自魏营子文化的因素。

魏营子文化结束以后，努鲁儿虎山以东的大小凌河流域出现的是一种含曲刃青铜短剑和不见三足陶器的“凌河遗存”，这种遗存的年代跨度较长，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战国晚期的燕文化到达之前。从文化内涵上看，这种遗存虽然主要都是平底陶器，但成分构成比较复杂，再加上发掘和发表的材料十分零散，所以性质问题一直比较模糊。关于它的来源，尽管有人认为可能与魏营子文化有关，但是从两者陶器的基本器类和青铜短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较大差异性来看，显然难以令人信服。从主要内涵上看，这种遗存当中有一部分因素与西部地区同时存在的夏家店上层文化、“水泉遗存”、“井沟子遗存”有关。还有一部分因素应该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文化成分，如青铜戈、双翼有铤铜镞等均中原式青铜器，小口双耳鼓腹壶的形制和河北玉皇庙文化（军都山文化）的同类陶器相近^[18]。而另外一部分因素，也是这种遗存的主体成分——叠唇筒腹罐、素面高颈壶、曲刃青铜短剑等，应该和辽东地区同期存在的“双房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这类因素很可能是双房文化自西周以后开始不断向北、向西拓展并且影响势力到达此地的结果。在大小凌河流域和辽东地区中间的辽西平原地区，目前尚未发现两周时



期的遗存。若日后这一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能够有所突破，那么一定会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西周至春秋时期，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教来河流域出现的是高台山文化西迁以后演变而成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到了战国早中期的时候这里出现的是“水泉遗存”和“井沟子遗存”（含“铁匠沟遗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这两种遗存既有共性（如都有双耳罐、叠唇罐等），又有个性（如“水泉遗存”不见鼓腹瓮和鬲，“井沟子遗存”不见角把罐）。究竟是属于同一种文化还是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现在还说不清楚。此外，两种遗存中除了都可以看到有来自东部“凌河遗存”晚期的影响因素以外，各自的来源均不明朗。由于在战国晚期到达这里的燕文化当中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非燕文化的土著因素^[19]，因此推断这两种遗存很可能融入后来的战国燕文化之中。

另外还需提到的是，大约与“凌河遗存”晚期和“井沟子遗存”、“水泉遗存”处于相同时期的凌源“五道河子遗存”，材料仅限一处墓地的11座墓葬，而且随葬品中只有青铜器而不见陶器^[20]。从青铜器的构成来看，既有中原式的柳叶形剑、长胡三穿戈和车器，又有北方草原风格的三角形和人形坠饰、连珠状坠饰、马形饰牌、牛形金饰牌，还有具备“凌河遗存”特点的鲐鱼形当卢。有人认为这类遗存的性质应该是冀北地区“山戎文化”晚期的代表性遗存^[21]，也有人认为这类遗存的墓制和葬俗与年代稍晚的完工、扎来诺尔等东胡族系的鲜卑墓葬相近^[22]。还有人认为这批遗存不宜归属辽西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知的任何一种文化^[23]。由此看来，“五道河子遗存”的来源和去向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也无法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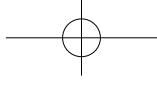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综合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夏至战国考古当中，辽西山地地区的发掘工作起步最早、所揭露的材料和取得的研究成果最多，但是真正能够说清楚的问题却是最少。尤其是在文化的定性和文化的谱系关系方面，除了夏家店上层文化以外几乎无一能说明白。所以，辽西山地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工作仍然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东北考古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二、两个时期两种不同性质的互动方式分析

以夏至早商、商代晚期、西周至春秋、战国四个年代段为时间背景，横向比较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往方式，可发现夏商时期的文化格局主要表现为相对稳定的等势文化之间短距离的交流与影响，而两周时期的文化格局则演变成强势文化的扩张、弱势文化的迁徙和远距离文化的渗透。

1. 夏商时期的互动方式——文化交流与影响

夏至商代早期，是东北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轨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外部三足陶器的传入与扩散。从具体的途径和情形来看，各地又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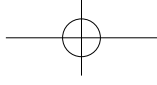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辽西山地地区受中原同期文化的影响，出现以绳纹甗、绳纹盆和尊式鬲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这种文化中的绳纹甗和绳纹盆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因素^[24]，而尊式鬲是外来文化因素和本土文化因素碰撞以后产生的新器形^[25]，由此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模式应该是当地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且通过文化借用的方式真正实现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

辽东南部地区受山东半岛同期文化的影响，先是出现以鼎、鬻等三足器为代表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26]和当地平底陶器共存的双砣子一期文化，而后又出现以素面甗、凸棱纹陶器为代表的山东岳石文化因素^[27]和当地平底陶器共存的双砣子二期文化。由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时期，始终表现为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并存，却一直没有碰撞出新的器类，从而表明它们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表现出的是一种排斥或抗衡状态，正是这种倔犟的文化性格和顽强的排外意识，使得先后来自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都未能最终取代双砣子一、二期文化而彻底占领辽东半岛的南部。也正是这样一种持之以恒的自我发展精神，致使“双砣子文化系”虽然地处东北地区的前沿，却在整个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始终保持着瓮、罐、壶等平底陶器的文化传统，而不用三足炊器。

辽西平原地区的“平安堡二期遗存”，地理位置处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双砣子一、二期文化之间。该遗存当中出现的三足器足尖标本，因为没有实足根也没有纹饰^[28]，因此不太可能是从夏家店下层文化流传过来的，相反倒有可能是山东岳石文化的素面陶甗经过辽东半岛间接传播至此的结果。这种外来的素面三足器到达此地后不久便和当地的传统平底器结合，产生出高台山文化早期的素面筒腹鬲、素面盆式鬲和素面小陶鬲^[29]。这表明夏至早商时期的“平安堡二期遗存”和高台山文化早期遗存对于外来的文化因素是持肯定态度的，不仅积极接受，而且还实现了实质性的融合。在这一点上，它和西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一样，而和南部的双砣子一、二期文化不同。

以上三个身处东北南部前沿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段上出现的三足陶器。但是只有高台山文化将这种新型陶器进一步向北、向东传播给了小拉哈文化和马城子文化（早期），从而使这两个地处内陆的考古学文化也在夏至早商时期拥有了像高台山文化素面鬲那样的三足陶器^[30]。而同期的西部夏家店下层文化尽管在当时看来应该是技术水平和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一支，但是由于它的发展势头一直瞄向燕山以南的华北地区，因此对东北其他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不够明显，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接受不少从高台山文化传递而来的素面陶鬲^[31]。南部的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由于长期处于同来自山东半岛文化的抗争之中，因此无暇顾及对北部地区的开发。正是由于两个窗口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动或被动地将精力放在了同中原和山东两个地区同期文化的较量和纠葛上，才使得高台山文化有机会完成了它对东、北、西三个方向上的文化影响和渗透。

如果将该阶段三足器在东北地区的出现和传播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那么中原文化区绳纹甗和山东文化区素面鼎、鬻、甗分别对辽西山地夏家店下层文化和辽东南部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应属第一层次。而通过双砣子二期文化将山



东岳石文化的素面甗传播给辽西平原北部的“平安堡二期遗存”应该是第二层次。高台山文化早期产生新的素面陶鬲以后又进一步地影响到辽东北部的马城子文化（早期）和嫩江流域的小拉哈文化及辽西山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则应该是第三层次。由此可见，三足陶器在东北地区的逐级传播，存在着骨牌式的联动效应。

在此期间，只有兴城文化因地处远而封闭的图们江山谷地带而没有受到外界文化的影响，所以没有出现三足陶器。

到了商代晚期，东北地区的文化格局和发展态势又有一些新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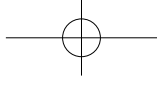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这一阶段辽东南部地区的双砣子一、二期文化已经演变成双砣子三期文化，由于这一时期来自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已经完全消退，新出现的珍珠门文化影响势力又极其微弱，因此使当地的传统文化得到快速地恢复和发展。据发掘到的这一阶段的遗址和墓葬材料来看，双砣子三期文化后来居上，实力已不落后于同期的其他任何文化。但是从文化交往关系上看，该文化既没有积极主动地向外扩张，也看不出有太多的对其他文化加以吸收或借鉴的迹象。

辽西山地地区继夏家店下层文化结束之后，发展起来的是魏营子文化。从这种文化的器物组合来看，有相当多的因素应该是来自于东部地区的高台山文化^[32]，这说明高台山文化（晚期）在这个阶段上仍然保持着对西部地区的强烈影响。但是相比之下，它的东进势头更加明显，所产生的影响力度也较夏至早商阶段有所加强。这一点从马城子文化晚期阶段的陶器群中出现比早期更多的鬲、甗、壶、碗等典型高台山文化器形上便可得到证实^[33]。

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活动于大小凌河流域并受到高台山文化较多影响的魏营子文化一举取代前阶段高台山文化对北部嫩江流域的影响，将以绳纹鼓腹鬲为代表的遗存向北传播给了嫩江流域的“古城类型”^[34]，并且对改变“古城类型”的面貌和促进后一个阶段白金宝文化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从高台山文化晚期陶器群中见有少量的陶鼎来看，表明该文化在与马城子文化的交往中，也或多或少地吸收一些对方的文化因素^[35]。

和上一个阶段一样，图们江流域的兴城文化只是完成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内部的期、段性变化，但仍未与外部文化发生交往。

总结夏商时期前后两个阶段的文化交往与影响方式，不难发现它们的共性是每一个文化系的活动区域都相对稳定，两个阶段的文化传承都在同一个区域内完成，文化之间的交往与影响主要表现为双向或单向的近距离文化传播与渗透。尽管有些文化，如高台山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文化交往和传播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活跃，也比较主动，甚至对周边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的马城子文化产生较强的影响，但是总的看来影响的力度还是有限的，至少是没有改变那里的文化传统，更没有因此而改变东北地区各文化系之间的大的格局。所以基于整个夏商时期文化的发展格局相对稳定、势力发展相对平衡的大背景而言，高台山文化应该算是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文化，但不是强势文化。



2. 两周时期的互动方式——文化扩张与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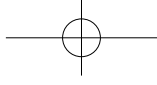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西周至战国时期，东北南部地区的文化格局曾经发生两次重大的变化。而导致这两次变化的直接原因，一是西周至春秋时期辽东双房文化的急剧扩张，一是战国时期中原燕文化的大举北进。

西周至春秋时期，由辽东南部双砬子三期文化蓄势演化而成的双房文化，此时发展到它所在文化系统的巅峰时期。依靠曲刃矛、曲刃剑等当时最先进的青铜武器，该文化开始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自己活动的中心区域由原来的辽东半岛南端迅速扩大到整个辽东地区，而且外围影响势力几乎覆盖大半个东北和东邻的朝鲜半岛地区。

从现有材料来看，在远离辽东而又有辽西平原相隔的辽西山地地区，不仅西周至战国早中期的“凌河遗存”中出现大量的与双房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曲刃青铜短剑和厚唇筒形陶罐^[36]，而且在努鲁儿虎山以西的西周至春秋时期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和战国早中期的“水泉遗存”中也可见到少量的同类遗物^[37]。此外，嫩江流域战国时期的汉书二期文化遗址中，曾经发现曲刃青铜短剑的石头附件^[38]。第二松花江流域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西团山文化遗存中，也存在较多的形态类似于双房文化的青铜器和陶器^[39]。另据研究，朝鲜半岛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出现和辽东南部地区双砬子一、二、三期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新岩里一期类型”和“新岩里二期类型”遗存^[40]。到两周时期，无论是陀螺形陶器还是“新岩里三期”和“美松里上层”陶壶，又都和双房文化的同类遗物存有十分密切的亲缘关系^[41]。还有在朝鲜半岛金谷洞、龙兴里和西浦洞等地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形制与双房文化的曲刃剑别无二致^[42]。这些考古发现证明，双房文化的影响势力曾经到达上述地区，并且对那里的传统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作为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支强势文化，双房文化的扩张直接导致两个事件的发生：一是夏商时期分布于辽东北部的马城子文化此时在无力抵挡双房文化北进的强大攻势之下，整体向北迁移到第二松花江流域，并且在那里演变成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西团山文化（少部分因素融入到了双房文化之中）；二是夏商时期活跃一时的高台山文化，出于同样的原因也被迫从原来的辽西平原北部向西迁移到辽西山地地区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并且最先在那里演变成夏家店上层文化，后又很快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扩大到老哈河和教来河流域。

从双房文化的扩张，到马城子文化和高台山文化的迁徙，再到东北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改变，三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首先是双房文化的扩张直接导致辽东北部地区和辽西平原地区文化格局的改变，然后是以双房文化扩张为原动力的马城子文化北迁和高台山文化西进而造成的第二松花江流域和辽西山地地区文化格局的相继变化。可见，文化扩张、文化迁徙和文化格局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是一种类似于骨牌效应所产生的连动关系。



如果说西周至春秋时期双房文化的急剧扩张,第一次引发东北南部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的改变;那么战国时期中原燕文化的北进,又使东北南部地区的文化格局产生第二次重大的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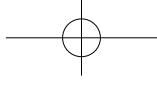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早在战国早中期,就有少量的燕文化因素渗透到东北,但因力度有限,所以没有给当地的传统文化造成太大的影响,甚至就连辽西山地地区战国早中期出现的“水泉遗存”、“井沟子遗存”、“凌河遗存”晚期等,也没有因此而受到自身发展上的限制。可是到战国晚期的时候,伴随着燕将秦开北却东胡,置五郡、筑长城、设边障、迁燕人到东北屯田戍守,使得大批的燕人进入东北南部的广大地区。这次燕文化的介入,不仅直接导致当地传统文化的消失,而且通过武力征服彻底实现了文化上的替代,并将所控制到的燕北长城以南地区正式纳入燕国的版图。

从以往的考古调查和勘定的结果来看,燕北长城的西段走向为围场经赤峰、敖汉、奈曼、库仑至阜新^[43]。东段据史地学家考证应自阜新、经彰武、法库、开原、新宾到宽甸,再向东进入朝鲜境内^[44]。按照一般的说法,燕人活动的区域应主要在燕北长城以南。但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一是燕人的活动范围应该较此有所扩大,因为在燕北长城以外的吉林梨树二龙湖发现了战国晚期的古城^[45];二是在出有战国晚期燕文化因素的广大区域内,辽西山地地区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一种完全的文化替代,辽西平原地区因没有发现所以暂不清楚,而辽东地区双房文化分布范围内,虽然也发现战国晚期燕文化的因素,但是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只是一种文化上的渗透或融入,而根本没有取代战国晚期双房文化(晚期)在辽东地区的主导地位。比如在南部的旅顺尹家村 M12 和北部的本溪上堡 M1 ~ M4 中均出有典型的战国晚期燕式豆或燕式罐^[46],但是同墓共出的更多的则是双房文化三期的罐、壶、豆和青铜剑。这表明在战国晚期阶段,东北南部的辽东地区并没有被燕文化所替代,相反倒是远道而来的燕文化被吸收到土著文化之中。辽东地区真正被中原文化所替代的时间,应该是稍晚一个阶段的汉文化时期。旅顺尹家村遗址出土的汉代文化遗存,便可视为最好的例证^[47]。

与南部地区相比,两周时期的北部嫩江流域和东部图们江流域则表现出另外一种情形。这两个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没有受到来自南部地区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化扩张与文化迁徙影响的情况下,也在相同的时间段上各自完成由夏商时期的“古城类型”、兴城文化(晚期)分别向白金宝文化、柳庭洞文化(早期)的过渡与转变。而这种转变主要是通过制陶技术和用陶理念的变革而得以实现的。

不仅如此,当战国时期燕文化大举北进并部分地取代南部地区本土文化的时候,嫩江和图们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却仍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嫩江流域由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白金宝文化过渡到战国时期的汉书二期文化早中期之后,又在战国晚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本地区以平洋墓葬晚期和大道三家子墓葬为代表的汉书二期文化晚期阶段。而图们江流域的柳庭洞文化在完成由早期(西周至春秋)向晚期(战国)过渡的基础上,后来又发展成本地区战国以后的团结文化和西部地区以



黄鱼圈珠山 M1 为代表的遗存。

这种在渔猎生业方式和封闭自然地理条件下由小拉哈文化系和兴城文化系进一步发展而演变成的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不仅没有衰落，而且在后来的两汉时期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实力甚至达到可以与中原地区秦汉文化相抗衡的地步。反过来看，中原地区的燕、秦、汉文化，之所以没有能够最终到达这里并实现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原因就在于这里存在着自夏至战国以来始终连绵不断、血脉相连并且一直保持着较强生命力的本土文化。

总之，东北地区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根据它们在不同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交往方式和格局的不同，区分成夏商时期和两周时期两种不同的情形：夏商时期各文化系的格局均表现为稳定的横向交流和一地式的持续性发展，两周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则分别是南部各文化系的异地扩张、迁移与替代和北部、东部文化系的一地式持续性演进与发展。

三、两种“文化区”与两个“文化带”的析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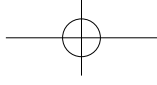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1. “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

考古学文化的纵横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各个自然地理区域内文化关系的异同。有连续性的、也有交替性的，由此便形成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文化区”。

将本文最初选定的用以建立不同地区考古学文化编年坐标的七个自然地理区域，同上面已经确立的六个考古学文化系统在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四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纵横谱系关系进行比较，很容易发现各自然区域内诸考古学文化之间所表现出来的关系，可区分为如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三个地区，分别是嫩江流域、图们江流域和辽东南部地区。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点是分布在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的诸考古学文化之间，不仅依次存在着年代上的早晚关系，而且彼此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如嫩江流域的小拉哈文化、“古城类型”、白金宝文化、汉书二期文化不但年代上是先后相继的，而且根据陶器的亲缘关系研究被认定为是彼此继承和发展关系。图们江流域的兴城文化和柳庭洞文化之间，辽东南部地区双砣子一、二、三期文化和双房文化之间表现出来的情况都是如此。由于以上自然地理区域内所蕴含的考古学文化，不论数量多少、演化速率快慢，相互间所表现出来的始终是一脉相传的承袭关系。换言之，这三个地理区域内所包含的诸考古学文化是同一群人在同一地点遗留下来的不同发展时段上的遗存。因此可称其为“系列考古文化区”。

第二种：两个地区，分别是辽东北部地区和辽西山地地区。这两个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共性分布在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的诸考古学文化之间，只是年代上的依次早晚关系，



而彼此之间并不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如辽东北部地区出土的年代相当于夏商时期的遗存是属于马城子文化系的马城子文化，而叠压在这种文化上面的是年代相当于两周时期的属于双砣子文化系的双房文化。两种文化虽有年代上的先后，但是彼此并非属同一文化系统。辽西山地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水泉遗存”、“井沟子遗存”、“凌河遗存”、燕文化等几种遗存之间所表现出来的情形亦是如此。由于以上两个自然地理区域内所蕴含的考古学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你来我往的交替存在现象，各文化之间仅仅体现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到达此处的时间先后。换言之，这两个地理区域内所包含的诸考古学文化应该是不同的人群在相同的地点遗留下来的具有年代先后关系的遗存。为便于和前面的“系列考古文化区”相区别，现可称其为“序列考古文化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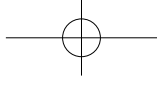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还有两个地区（第二松花江流域、辽西平原地区），因为只发现了一种考古学文化，所以暂时难以判定它们应该属于哪种类型。如第二松花江流域只发现了两周时期的西团山文化，而未见夏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尽管可以证明本地西团山文化的前身应该是辽东北部地区夏商时期的马城子文化，但是在没有找到和确认第二松花江流域夏商时期遗存面貌以前，仍然不能断定第二松花江流域是“序列考古文化区”还是“系列考古文化区”。因为一旦发现该地区的夏商时期遗存和马城子文化一样，那么这个区域就应该是“系列考古文化区”，反之，则为“序列考古文化区”。辽西平原地区的情况亦是如此。

从本文所揭示的具体情况来看，“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的划分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形成“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的原因，主要与考古学文化是否发生过异地性扩张或迁徙有关。区分“系列考古文化区”和“序列考古文化区”的办法，是对同一个地区或几个不同地区内诸考古学文化进行时空关系和谱系关系的比较研究。

2. “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和“长白山—千山文化带”

将不同文化区所处的空间位置关系和各文化区包含的不同文化系统，在自然环境、文化特点、历史传统等背景下进行更宏观的对比研究，往往还可以划分出由不同“文化区”所构成的更大的文化区块，为了便于和“文化区”相区别，这里称其为“文化带”。

在如何划分东北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块问题上，张忠培先生最早提出过“哈尔滨至沈阳铁路沿线应是将东北区分为面向亚洲腹地和海洋的两大区域的中间地带”的认识^[48]。后来乔梁先生又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更加具体地提出了东北地区可划分为“以大兴安岭及其延伸地带为轴心的东北地区的西部”和“以长白山地及其延伸地带为轴心的东北地区的东部”的认识^[49]。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上述两种划分意见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仍然是正确的。这里为行文方便，暂将“以大兴安岭及其延伸地带为轴心的东北地区的西部”简称为“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将“以长白山地及其延伸地带为轴心的东北地区的东部”简称为“长白山—千山文化带”，并就这两个文化带的划分进



一步提出以下几点说明。

首先,从两区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区来看,西部的“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主要应该是以大兴安岭和燕山山地为依托、以东北大平原的中西部地区为活动前沿。本文划分的辽西山地地区、辽西平原地区和嫩江流域三个文化区应该属于这个区域;东部的“长白山—千山文化带”主要应该是以长白山和千山山地为依托、以东北大平原东部的一小部分狭长地段为活动前沿。本文划分的辽东南部地区、辽东北部地区、第二松花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四个文化区应该属于这个区域。

其次,从文化内涵的主要特点来看,西部“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中所包含的高台山文化系和小拉哈文化系,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魏营子文化、“井沟子遗存”等,普遍以鬲为主要炊器(鼎为东来的文化因素),并且多数存在绳纹。墓葬以土坑墓为主要形式(石棺墓较少),随葬的典型器物为直口或杯形口的陶壶,壶上主要流行竖桥耳;东部“长白山—千山文化带”中所包含的“双砬子文化系”、马城子文化系和兴城文化系中的诸文化,普遍有豆,并以罐、鼎为主要炊器(鬲为西来文化因素),不见绳纹。以石构墓葬为主,先后流行积石墓、洞室墓、石棺墓、大石盖墓、石棚等。墓中随葬陶器以喇叭口壶和钵口壶最具特色,壶上施横耳、扳耳者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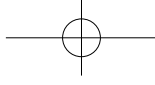
第三,从文化传统和与中国内地的文化关系上看,西部“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来往,到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联系更加紧密。由于该文化带通过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区的陆路通道与“面向内陆”部分或称“面向亚洲腹地”部分连成一体,因此从整体上可将它们看做是同一个大的文化板块;东部“长白山—千山文化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辽东半岛并通过渤海海峡同山东半岛保持着频繁的文化交往,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依然如此。因这一部分始终通过水路与南部的“面向海洋”部分相连,因此可从整体上将它们看成是同一个大的文化板块。

最后,从东西两区的活动界线或者说是两个文化带争夺的前沿地带来看,可基本按照张忠培先生提出的“哈尔滨至沈阳铁路沿线”一说画出一个大致的界线。不过结合本文的认识来看,这条界线似乎自南往北可区分为三段。南段可以下辽河—秀水河为界,中段可以哈尔滨与东辽河入河口之间的连线为界,北段可以呼兰河及其向北延长线为界。将这三段连接起来,便可初步看做是西部“大兴安岭—燕山文化带”和东部“长白山—千山文化带”之间的一条理论分界线。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给出的只是一个大致的范围,而实际情况可能根本就不应该是一条线,而应该是大致以这条线为中轴并呈东北—西南向走势的一个比较狭长的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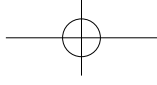
总之,以上两个文化带的划分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而有意义的。特别是将两个文化带和六个文化系紧密地联系起来考虑,对于进一步揭示东北地区青铜时代(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区系与后来形成并见于文献记载的不同人群族团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有益的启示作用。

注 释

- [1] 赵宾福. 东北地区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 (7).
- [2] 赵宾福. 关于双砬子一、二期文化的三点新认识 [J]. 东北史地, 2010 (6): 图二, 54、55.
- [3] 赵宾福. 关于双砬子一、二期文化的三点新认识 [J]. 东北史地, 2010 (6): 图三, 24 ~ 40.
- [4] a. 王青. 试论山东龙山文化郭家村类型 [J]. 考古, 1995 (1).
b. 吴玉喜. 岳石文化地方类型初探 [A]. 考古学文化论集 [C] (三).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3.
c. 栾丰实. 岳石文化的分期和类型 [A].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C].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d. 陈光. 羊头洼类型研究 [A]. 考古学文化论集 (二)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5] 赵宾福. 以陶器为视角的双房文化分期研究 [J]. 考古与文物, 2008 (1): 图七.
- [6] 栾丰实. 岳石文化的分期和类型 [A]. 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C].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7: 图一, 6; 图三, 3、8.
- [7] 蔡凤书. 关于貔子窝的陶器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3 (2): 图二.
- [8] 张忠培. 辽宁古遗存的分区、编年及其他——“环渤海考古”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1 (1).
- [9] 朱永刚. 论高台山文化及其与辽西青铜文化的关系 [A]. 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论文集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 [10]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 [A]. 边疆考古研究 (5)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六, 3、7.
- [11]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 [A]. 边疆考古研究 (5)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三, 21.
- [1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镇江营与塔照——拒马河流域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 [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 [13] 张忠培. 西拉木伦河地区考古学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历史地位 [A]. 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5 (7).
- [14] 赵宾福, 张伟. 论小拉哈文化 [J]. 北方文物, 2008 (2): 图二.
- [15] 赵宾福. 古城类型: 嫩江流域商代晚期遗存辨识——兼谈嫩江流域陶鬲的起源与演变 [A]. 新果集——庆祝林沅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图一.
- [16] 乔梁. 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之后的几种古代遗存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3 (2).
- [17] 郭大顺. 试论魏营子类型 [A]. 考古学文化论集 (一)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7.
- [18] 杨建华. 再论玉皇庙文化 [A]. 边疆考古研究 (2)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 [19] 郑君雷. 战国燕墓的非燕文化及其历史背景[J]. 文物, 2005(3).
- [2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89(2).
- [21] 靳枫毅等. 山戎文化所含燕与中原文化之分析[J]. 考古学报, 2001(1).
- [22] 朱永刚. 大小凌河流域含曲刃短剑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相关问题[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二)[C].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23] 王立新. 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J]. 考古学报, 2004(3).
- [24]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A]. 边疆考古研究(5)[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二, 13、14、17~20.
- [25]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A]. 边疆考古研究(5)[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二, 3、4.
- [26] 赵宾福. 关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的三点新认识[J]. 东北史地, 2010(6): 图二, 54、55.
- [27] 赵宾福. 关于双砣子一、二期文化的三点新认识[J]. 东北史地, 2010(6): 图三, 24~40.
- [2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辽宁彰武平安堡遗址[J]. 考古学报, 1992(4): 图九, 18、19.
- [29] 赵宾福. 高台山文化再论[J]. 华夏考古, 2011(1): 图一, 19; 图二, 34~37、39.
- [30] a. 赵宾福, 张伟. 论小拉哈文化[J]. 北方文物, 2008(2): 图二, 1.
b. 赵宾福. 马城子文化新论——辽东北部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整合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6)[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六, 28、29、35~38、40.
- [31]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A]. 边疆考古研究(5)[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二, 5、6.
- [32] 赵宾福. 高台山文化再论[J]. 华夏考古, 2011(1): 图五, 1~5.
- [33] 赵宾福. 马城子文化新论——辽东北部地区夏商时期遗存的整合研究[A]. 边疆考古研究(6)[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三、图四、图六.
- [34] 赵宾福. 古城类型: 嫩江流域商代晚期遗存辨识——兼谈嫩江流域陶鬲得到起源与演变[A]. 新果集——庆祝林沅先生七十华诞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图一, 1、2.
- [35] 赵宾福. 高台山文化再论[J]. 华夏考古, 2011(1): 图二, 8.
- [36]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A]. 边疆考古研究(5)[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一〇, 11、22、1、12.
- [37] 赵宾福. 辽西山地夏至战国时期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研究的再检讨[A]. 边疆考古研究(5)[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7: 图一二, 3~5、10、11.
- [38] 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 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A]. 东北考古与历史(1)[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图三.
- [39] 赵宾福. 西团山文化分期研究[J]. 考古学报, 2009(4): 图一六, 1、2、5、6、9、10.
- [40] 王巍. 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A]. 中国考古学论丛[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图二六、二八.



- [41] a. 王巍. 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大同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 [A].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 [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图八.
b. 王巍. 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 [A]. 中国考古学论丛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图三〇.
- [42] 靳枫毅. 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 [J]. 考古学报, 1983 (1): 图一九, 1 ~ 3.
- [43] 佟柱臣. 东北历史和考古中的几个问题 [A]. 东北考古与历史 (1) [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 [44] 李殿福. 东北境内燕秦长城考 [J]. 黑龙江文物资料丛刊, 1982 (1).
- [45] 四平地区博物馆等. 吉林省梨树县二龙湖古城址调查简报 [J]. 考古, 1988 (6).
- [46] 赵宾福. 双房文化青铜器的型式学与年代学研究 [J]. 考古与文物, 2010 (1): 图三, 6、13、14.
-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R].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6.
- [48] 张忠培. 黑龙江考古学的几个问题的讨论——1996年8月24日在“渤海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 [J]. 北方文物, 1997 (1).
- [49] 乔梁. 吉长地区西团山文化之后的几种古代遗存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3 (2).

Research on the Genealogical Structure of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Zhao Bin-fu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n this thesis, the archaeology culture of the Bronze Age in the Northeast China are classified into 6 systems including Shuangtuozi cultural system, Machengzi cultural system, Gaotaishan cultural system, lower Xiajiadian cultural system, Xiaolaha cultural system, Xingcheng cultural system, which inherited from one to another. It is found that the evolution structure involves regular cultural exchange and influence and irregular cultural immigration and aggression. The author listed areas of Nenjiang River, Tumenjiang River and Liaodong Peninsula as “Serial Archeology Culture Area”. Liaoxi Mountain Area and Liaodong Northern Area as “Sequential Archeology Cultural Area”. The author also considers that there were two cultural belts in the Bronze Age of Northeastern China: “Da Hinggan Mountain-Yanshan Mountain culture belt” and “Changbai Mountain-Qianshan Mountain culture belt”.